

「革命女傑」再探：俄國革命者  
「蘇菲亞」形象在日本與中國的  
流播與轉化（1881-1911）\*

詹 宜 穎\*\*

摘 要

本文從跨文化傳播與翻譯的視角，探討 19 世紀俄國革命者書寫的《地下的俄羅斯》以及其所描述的「蘇菲亞」形象，如何在日本的政治小說《鬼啾啾》、歷史學術著作

---

\* 本文改寫自博士論文《女虛無黨人在近代中、日知識圈的再現與挪用（1870s-1911s）》。修改期間感謝編輯委員與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23 年 6 月 26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 年 12 月 13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東華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

《近世無政府主義》、中國的小說《東歐女豪傑》、傳記〈俄國虛無黨女傑沙勃羅克傳〉等著作中，因應著國家面臨的現代政治轉型而不斷被轉化。本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俄國革命者司特普尼亞克撰寫《地下的俄羅斯》的動機、策略，以及「蘇菲亞」在其著作中的形象與意義；第二部分探討日本民權運動家宮崎夢柳改編的《鬼啾啾》所呈現的「蘇菲亞」形象；第三部分探討歷史學者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內「蘇菲亞」的形象轉化；第四部分聚焦中國知識人根據日人著作所譯述的「蘇菲亞」形象的特色和政治意義。追索「蘇菲亞」的事蹟及其形象的源流，當更能清楚勾勒其形象在數種文化脈絡中的意義轉化，同時也能呈現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全球化脈絡下政治宣傳、文化詮釋與象徵彼此交織的圖景。

關鍵詞：女傑、虛無黨、蘇菲亞、恐怖分子、革命

## 前言

1881 年 3 月 1 日，<sup>1</sup> 俄國的民粹主義團體「人民意志」（Narodnaya Volya）執行委員會中的數名成員，以投擲炸彈的方式暗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1818-1881）。主謀者遭逮捕之後，有 6 人被處絞刑而死。<sup>2</sup> 蘇

---

1 此日期為儒略曆日期。俄國曆法有格里曆（Gregorian，即西元日期）與儒略曆（Julian），19 世紀曆法計算是格里曆減 12 為儒略曆。因此，儒略曆為 3 月 1 日，格里曆為 3 月 13 日。

2 義大利史家佛朗哥·文圖里（Franco Venturi, 1914-1994）曾詳細說明該

菲亞·佩羅夫斯卡亞（Sophia Perovskaya, 1853-1881，文後簡稱蘇菲亞）是當中唯一一位女性。事件發生時，歐美的新聞媒體還不能明確定位這場俄國的暴力事件，因而對這群暗殺者，有虛無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恐怖分子等各種各樣的稱呼。<sup>3</sup> 這起震撼國際的暗殺事件，陸續在日本與中國知識圈內引發關注，也開始出現「蘇菲亞」相關的報導、小說、傳記，並且與其他的西方女傑，如：羅蘭夫人（Marie-Jeanne Roland, 1754-1793）、聖女貞德（Jeanne d'Arc, 1412-1431）等人相提並論。為什麼暗殺皇帝的蘇菲亞卻能獲得「女傑」稱號？她的形象如何在傳播過程建立起來？

胡纓（Hu Ying）的研究極具代表性，她從塑造「中國新女性」的角度，探討中國的知識人如何將俄國的無政府主義暗殺者「Sophia」轉譯為中國新女性「蘇菲亞」。<sup>4</sup> 胡纓

---

事件始末。見 Franco Venturi, *Root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19th Century Russia* (London: Phoenix Press, 2001), pp. 708-720. 此處所謂民粹主義運動，或可稱之為俄式民粹主義，指的是由貴族菁英與城市的知識人提倡民主化改革，幫助農民提升知識、不受地主經濟損害，對抗政治菁英的運動。俄國的民粹主義運動，深受法國大革命與社會主義的影響。見卡斯·穆德（Cas Mudde）、克里斯托巴·卡特瓦塞爾（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著，徐承恩譯，《民粹主義》（新北：左岸文化，2022），頁 58-59。

3 文圖里認為這些名稱各自表達民粹主義運動的其中一個面向，因此筆者不希望只以「無政府主義」稱之。見 Franco Venturi, *Root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19th Century Russia*, p. xxxiii.

4 本文使用「知識人」而不用「知識分子」，源自余英時的看法。余英時認為：「『知識人』這個名詞也是借用 intellectual 的日譯。……我反而覺得『知識人』比『知識分子』更為適切。……我想儘量恢復『intellectual』的『人』的尊嚴。」見余英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臺北：

認為，中國的作者羅普（1876-1949）撰作的《東歐女豪傑》，小說中的「蘇菲亞」具備「反抗權威」的自主性——爲了求學反抗父親，參與革命反抗沙皇。這樣的形象使得中國的女革命者秋瑾（1875-1907）將她視爲值得效法的反清革命榜樣。<sup>5</sup> 此外，20世紀初期的中國刊物也有多篇譯述自日本學者煙山專太郎（1877-1954）《近世無政府主義》（1902）的蘇菲亞傳記。<sup>6</sup> 胡纓認爲這些傳記描繪出反傳統的英雄女俠「蘇菲亞」，既具備「孝」的美德、鮮明的女性特質，還有強烈的自我犧牲精神。<sup>7</sup>

這些「新女性」形象也聯繫到男性知識人拯救民族的動機。<sup>8</sup> 符杰祥指出「蘇菲亞」形象與中國國族的建構密不可分：「蘇菲亞的故事在晚清大受歡迎，不在於其女英雄的神話是否合乎歷史真實，而在於它滿足了危機時代國族主義塑造女英雄神話的歷史需要。」<sup>9</sup> 換言之，正因中國處於國家

---

時報文化，2007），頁215-216。

5 胡纓著，龍瑜宸、彭姍姍譯，《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126。

6 詳細討論見本文第四部分。

7 胡纓著，龍瑜宸、彭姍姍譯，《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頁132-133。與胡纓相反的是，田露（1979-）也曾探究「蘇菲亞」形象在中國文學當中的呈現，但她認爲「蘇菲亞」形象傳入中國後，反而是成爲傳統俠義小說的資源，在現實中「並未對中國新女性的塑造和成長產生如預想般重大的作用」。但她並未對此提出論證，胡纓的觀點反而更令筆者信服。田露，〈蘇菲亞形象的傳入與晚清俠義小說創作的轉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期2（2010年），頁61。

8 胡纓著，龍瑜宸、彭姍姍譯，《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頁171。

9 符杰祥，《國族迷思：現代中國的道德理想與文學命運》（臺北：秀威，2015），頁45。

存亡危機時刻，「蘇菲亞」暗殺沙皇的形象被挪用於革命救國，成為中國革命黨人心目中的女英雄。

上述的研究展示了中國譯者如何調動資源，詮釋「中國蘇菲亞」的女傑形象，並成功塑造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典範。但筆者更想繼續追問，如果中國知識人看到的「蘇菲亞」是根據煙山的著作加以譯述，那麼煙山看到的「蘇菲亞」，又是來自何處？

日本文學研究者越智治雄曾提及，「蘇菲亞」在日本自由民權運動時期（1874-1884）出現在宮崎夢柳（1855-1889）的政治小說《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此為日文原書名，意為據實紀錄的傳記，可譯為「虛無黨實錄傳記」。後文簡稱《鬼啾啾》），而且被形塑為爭取人民權利的女志士。<sup>10</sup> 宮崎在小說的序文裡，直接指出《鬼啾啾》是改寫自俄國革命者謝爾蓋・司特普尼亞克-米哈伊洛維奇・克拉夫欽斯基（Sergey Stepniak-Mikhailovich Kravchinsky, 1851-1895，後文簡稱司特普尼亞克）的《地下的俄羅斯：革命人物簡介與生活素描》（*Underground Russia: Revolutionary Profiles and Sketches from Life*, 1882）。<sup>11</sup> 無獨有偶，《地下的俄羅斯》也是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的參考書目之一。

根據這些線索，筆者希望從跨文化轉譯的視角，探討「蘇

---

10 越智治雄，〈地底の夢柳——虛無党のイメージ〉，《日本文学》，卷22期7（1973年7月），頁9-12。越智治雄，〈地底の夢柳（二）——虚無党のイメージ〉，《日本文学》，卷22期12（1973年12月），頁64-72。

11 宮崎夢柳，〈緒言〉，《虚無党實傳記・鬼啾啾》，收入山田有策、前田愛注釋，《日本近代文學大系2・明治政治小説集》（東京：角川書店，1974），頁50-51。

菲亞」形象如何從歐洲、日本到中國，因應著國家所面臨的現代政治轉型而有所轉化。文章聚焦於 1881 至 1911 年，主要因為 1881 年 3 月亞歷山大二世遭到暗殺，司特普尼亞克於年底開始撰寫《地下的俄羅斯》，開啓「蘇菲亞」的形象傳播；1911 年則是中國爆發辛亥革命的一年，在這 30 年中，歐洲的「暗殺者」、「虛無主義者」抑或是「恐怖分子」「蘇菲亞」，究竟如何變為「女傑」？

職此，本文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俄國革命者司特普尼亞克撰寫《地下的俄羅斯》的動機、策略，以及「蘇菲亞」在其著作的形象與意義；第二部分探討日本民權運動家宮崎夢柳改編的《鬼啾啾》所呈現的「蘇菲亞」形象；第三部分探討歷史學者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內「蘇菲亞」的形象轉化；第四部分聚焦中國知識人根據日人著作所譯述「蘇菲亞」形象的特色和政治意義。追索「蘇菲亞」的事蹟及其形象源流，當更能清楚勾勒其形象在數種文化脈絡之中的意義轉化，同時也能呈現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全球化脈絡下政治宣傳、文化詮釋與象徵彼此交織的圖景。

## 一、將「革命典範」帶往世界： 俄國革命者的回憶錄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遭到暗殺之後，俄國革命者司特普尼亞克正流亡於歐洲。他曾參加俄國知識階層的「走入民間」革命宣傳運動。<sup>12</sup> 1878 年 8 月 4 日，他行刺俄國警察總長

---

12 走入民間運動，指的是俄國智識階層（包括貴族與中產階級）認為自己

的梅澤涅夫 (Nikolay Vladimirovich Mezentsov, 1827-1878)，竟躲過警察的追捕，逃離俄國。<sup>13</sup> 爲了經濟方面的需要，同時也希望協助國內的革命運動，他於 1881 年 11 月 8 日開始在義大利米蘭的報紙 *il Pungolo* 刊載俄國革命運動的介紹文章。<sup>14</sup> 1882 年他將這些文章集結成 *La Russia Sotterranea* (義大利文，即「地下俄羅斯」) 出版。這本書是俄國革命倖存者所寫的第一本「俄國革命殉道記」。<sup>15</sup> 當時歐洲各國亟欲了解俄國發生的革命運動。1870 年代末期，不少歐洲報紙，如《泰晤士報》(*The Times*) 雖派遣通訊員至俄國報導其國情勢，但發布的新聞仍會受到俄國當局的審查。<sup>16</sup> 流亡歐

---

有使命啟蒙人民，但同時又感到自己並不瞭解人民，認為「要成爲一個自由的人，必須走向人民」，而在 1874 到 1877 年間向農民宣傳講道的運動。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1842-1921) 回憶錄曾提及司特普尼亞克向農民講道的趣聞：「我開始告訴農民說他不應該納稅，官員掠奪人民，我試圖引用聖經說服他，他們必須造反。農夫拉起他的馬，但我們很快跟上去；他讓他的馬跑，我們在他身後跑；我一直和他談論稅收和叛亂，最後他讓他的馬奔馳，但這匹動物不過是隻吃不飽的農民小馬，所以我和我的同伴沒有落後，我們繼續宣傳，直到我們喘不過氣。」見 Peter Kropotkin, *Memoirs of Revolutionist II*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99), p. 112.

13 暗殺始末，文圖里有十分清楚的描述，見 Franco Venturi, *Root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19th Century Russia*, p. 610.

14 第一篇連載文章發表的時間參見 Evgeniia Aleksandrovna Taratuta, *C.M. Стеньяк-Кравчинский —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и писатель* (謝爾蓋·米海爾·司特普尼亞克·克拉夫欽斯基——革命者和作家) (Moscow: Khudozh lit., 1973), p. 233.

15 俄國文學研究者帕蒂克稱之為 Russian revolutionary martyrologies，見 Lynn Ellen Patyk, “Remembering ‘The Terrorism’: Sergei Stepniak- Kavrchinskii’s *Underground Russia*,” *Slavic Review* 68:4 (Winter 2009), p. 770.

16 Lynn Ellen Patyk, “Remembering ‘The Terrorism’: Sergei Stepniak-

洲，同時曾經實際參與俄國革命的司特普尼亞克，成為回應歐洲讀者對俄國革命運動興趣的不二人選。《地下的俄羅斯》最初在義大利印了1200冊，很快就售罄；1883年出版英文版，也很快銷售完畢。由於好評不斷，葡萄牙、德國、法國、荷蘭等國家的譯本也接續出版發行。<sup>17</sup>

此後他經常在歐美的報刊上發表文章。<sup>18</sup>《地下的俄羅斯》是他邁向「恐怖分子作家」的第一步，隨後他又出版《沙皇治下的俄羅斯》（*Russia Under the Tzars*, 1885）、《俄羅斯的暗雲》（*The Russian Storm-Cloud*, 1886）、小說《虛無主義者的事業》（*The Career of a Nihilist*, 1890）等著作。由於俄國革命者與政治流亡者的身分，他受到許多人的關注。美國記者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 1904-2005）在1890

Karvchinskii's *Underground Russia*," *Slavic Review* 68:4 (Winter 2009), p. 767.

- 17 值得一提的是，德文版在發行後，隨即被官方禁止出版。見 K.Staatsministerium des Innern (hg.): *Amtsblatt des Königlichen Staatsministeriums des Innern*, Vol. 12 (Munich: Akademische Buchdruckerei von F. Staub, 1884), p. 62. 而俄文版則要到1905年俄國爆發一月革命後，由俄國的青年加以翻譯出版。這本書對當時的俄國青年而言，既是鼓舞人心的文學作品，也是革命者自我塑造的手冊。關於《地下的俄羅斯》出版情況，見 Lynn Ellen Patyk, "Remembering 'The Terrorism': Sergei Stepniak-Karvchinskii's *Underground Russia*," *Slavic Review* 68:4 (Winter 2009), pp. 768-771. 感謝成功大學歷史系張哲維助理教授提供德文版出版查禁的相關資訊。
- 18 他所發表的文章，主要是關於俄國國內情勢的發展，以及俄國情勢對歐美可能產生的影響。這也是當時歐美各國想要知道的訊息。見 S. Stepniak, "The Russia Army," *The Times* (London), 7 August 1885, p. 14. Sergius Stepniak, "What Americans can do for Russia,"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Boston) 153:420 (November 1891), pp. 596-609. Sergius Stepniak, "How the Czar's death Affects Europe,"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59:457 (December 1894), pp. 735-741.



年底更曾邀請他到美國紐約演說，知名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曾是其聽眾。<sup>19</sup> 遺憾的是，1895年12月23日，他在前往朋友家的途中被火車輾過不幸身亡。<sup>20</sup>

知名的俄國民粹派思想家拉夫羅夫（Peter Lavrov, 1823-1900）在《地下的俄羅斯》序文強調，當時歐洲社會關於俄國革命運動的描述，幾乎都是失真的記載，而流亡海外的俄國革命者，極少有人能用歐洲的語言介紹革命事件的全貌。司特普尼亞克是這之中少數能用優美的歐洲語言生動描繪革命運動中人物和事實的革命者。<sup>21</sup>

如前所述，歐洲報界常以「虛無主義者」（nihilist）稱呼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革命者。司特普尼亞克深知「虛無主義者」一詞的模糊性。這個詞在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1818-1883）小說《父與子》裡首次出現，指的是全盤否定俄國的宗教信仰與道德傳統，強調個人自由，並相信科學與效益的青年。<sup>22</sup> 但在俄國暗殺事件頻傳之後，它變成恐怖主義者的代名詞。司特普尼亞克在《地下的俄羅斯》

---

19 他前往美國演說的相關研究可見 Jane E. Good, "America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1888-1905," *The Russian Review* 41:3 (July 1982), pp. 273-287.

20 關於司特普尼亞克的死訊，英、美不少報紙都曾報導此事 "Stepniak Dead," *Boston Daily Globe* (Boston), 24 December 1895, p. 4. "Death of Sergius Stepniak: Killed at a Level Crossing,"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Manchester), 24 December 1895, p. 8.

21 Lavrov, "Preface," in 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Revolutionary Profiles and Sketches from Lif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3), pp. v-x. 本文以 1883 年紐約二版為主要的版本。中文為筆者所譯，文後相關引文皆為筆者翻譯，若引用他人譯文，將以隨頁註說明。

22 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著，耿濟之原譯，陳逸重譯，《父與子》（新北：遠景，2016），頁 44。

裡重新定義「虛無主義者」。書的第一部分，他將革命運動的歷史追溯到 1860 年代，認為一開始的虛無主義者只是一群懷抱理想主義，追求個人幸福的個人主義者，雖渴望改變，卻沒有積極的行動。1870 年代，虛無主義者進入鄉村，嘗試啓蒙農民，但卻遭到政府鎮壓，發生了 193 人大審判事件。虛無主義者內在的憤懣，讓他們開始轉向暗殺。雖然歐洲社會仍以「虛無主義者」來描述他們，但其內在已經有了巨大的改變。他們決定從智識的啓蒙，轉向流血的行動。<sup>23</sup> 他要強調的是，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革命者，不是殘忍暴亂的兇手，而是恪守道德規範（morally scrupulous），爲了爭取自由而犧牲，值得公眾欽佩和同情的人。同時，他也顛倒了「恐怖主義者」的意義。他在「恐怖主義」（The Terrorism）一章裡描述 19 世紀末的俄國革命者是爲了自由理想而戰的人：

他有鮮明的個性，他不再像他的前輩那樣自我放棄，他不再擁有，也不再追求那抽象的道德美（moral beauty），……他是一股不能容忍任何束縛的個人力量。他不僅爲人民而戰，使他們成爲自己命運的決定者，不僅爲困於這種有害氛圍中的國家而戰，同時也是爲了他自己，爲他所愛的、他所崇拜的，他以熱情充實他的靈魂。……他爲自己而戰，他發誓要自由，而且他將不顧一切獲得自由。他不屈服於任何偶像，

---

23 司特普尼亞克指出：「革命者不再與五年前（筆者按：1873 年）相同了。他沒有以任何大膽的舉動暴露自己，而是通過不斷思考、反覆以子彈取代文字；在內心中構思流血的計畫，他的精神內化到他的氣質之中，因而形塑了他。政府竭盡全力地發展他這些傾向，並迫使他將這些傾向轉化爲行動。」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p. 3-42.

他將自己堅強的手臂奉獻給人民的事業。但他不再神化人民。如果那些人民向他說：「做奴隸吧。」他會喊道：不！並且無視於他們的咒罵和憤怒，繼續前進，因為他相信正義將會降臨至他的墳墓裡。

這就是恐怖主義者。<sup>24</sup>

他想改變人們對「恐怖主義者」的認知。書的第二部分，他開始以「記傳者」和「政治宣傳者」的雙重身分，刻畫這些為理想犧牲的「恐怖主義者」。

司特普尼亞克在書中介紹了 8 個人，分別是 5 位男性：雅科夫·斯特凡諾維奇（Yakov Stefanovich, 1854-1915）、德米特里爾斯·克萊門斯（Demetrius Clemens, 1845-?, 1879 流放西伯利亞）、瓦萊里安·奧辛斯基（Valerian Ossinsky, 1852-1879）、彼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德米特里爾斯·利索古（Demetrius Lisogub, ?-?），與 3 位女性：海珊·赫夫曼（Gesia Gelfman, 1855-1882）、薇拉·查蘇利奇（Vera Zasluch, 1849-1919）、蘇菲亞·佩羅夫斯卡雅（Sophia Perovskaya, 1853-1881）。這 8 人在當時的歐洲，並非無名之輩。舉例來說：出身貴族的思想家克魯泡特金，遊走於歐洲、美國，為報刊撰寫文章；暗殺俄國警察總長特雷波夫（Fyodor Trepov, 1809-1889）卻被判無罪的薇拉，曾經引起歐洲的轟動；<sup>25</sup> 出身貴族，主持

---

24 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 42.

25 薇拉·查蘇利奇於 1878 年 1 月 24 日持手槍暗殺特雷波夫。她被捕後，政府與貴族均希望嚴懲暗殺者，但最終法官與陪審團採用律師的意見，認為她暗殺的目的是控訴特雷波夫濫用國家力，鞭打獄中的囚犯，宣判薇拉無罪。事件始末在歐美各國均有報導。見 “Vera Sassulitch,” *Chicago Tribune* (Chicago), 12 May 1878, Sec. 4, p. 4.

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蘇菲亞，同樣也使歐美震撼。他們的事蹟多次出現在歐美的報刊上，並引起小說家、媒體的興趣，而對他們的形象有各式各樣的想像。

司特普尼亞克請讀者不要在他所選擇的主題或介紹的人物順序中尋找政治意義。他在「人物簡介」的前言表示：「我只會談論那些我自己認識的人，這充分表明我的選擇純屬偶然。……至於記事的順序，我既不考慮參加者的重要性，也不考慮他們的名氣。因此在這一運動中，我既沒有以蘇菲亞·佩羅夫斯卡雅、薇拉·查蘇利奇；也沒有以彼得·克魯泡特金開始。」<sup>26</sup> 這段文字已經顯示出，他很清楚蘇菲亞、薇拉和克魯泡特金在歐洲廣為人知的程度。但他希望讀者能從革命者日常的生活樣貌和道德表現來認識這些人，而不是他們的令人恐懼的暗殺行動。

他對這8位俄國革命者生平事蹟的描述，並未採取嚴謹的傳記（Biography）形式，而是根據他自身的回憶紀錄他們在革命期間的生活。他表示他是以「完全的誠實（perfectly truthful）」描繪這些革命者「內在的生活」（inner life），並「呈現他們原本的樣子」（show them as they are）。<sup>27</sup> 他強調回憶的形式是最能夠保存地方色彩細節的方式：

我為我的敘述選擇了一種有點鬆散（frivolous）的形式；我指的是個人回憶（recollections）——最適合保存地方色彩（local colour）的細節。這些細節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們有助於使人了解革命的俄羅斯的

---

26 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 46.

27 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 45.

特殊生活。這是我主要的目標，不，唯一的目標。<sup>28</sup>

他的書寫帶有緬懷朋友的紀念性質。他希望記錄下這些曾經與他一起生活的朋友在他心中的樣貌。他曾在一封寫給薇拉·查蘇利奇的信上提到：「《地下的俄羅斯》裡我最重視的部分是人物簡介，因為我確實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這些人，我想做點什麼，至少讓他們的形象（images）不會消失在俄羅斯的政治生活的沸騰深淵（burliashchei puchine）之中。」<sup>29</sup> 聚焦於個人的回憶，司特普尼亞克這本充滿紀念革命性質的著作，也是為了博取歐美讀者的好感。就如書中所說，他預設讀者是會同情於受折磨之革命者的「良善／好的讀者」，正因如此，他要對這些讀者說出（他們不知道的）革命運動的一切。<sup>30</sup>

司特普尼亞克的書寫策略，俄國文學研究者琳恩·帕蒂克（Lynn Ellen Patrk）認為，司特普尼亞克所選擇的發表媒介（歐洲的主要報刊）、人物簡介的形式和高度個人化的「回憶」，開創了嶄新的視角——他讓恐怖分子成為「名人」（celebrity），藉著書寫提升他們的名聲，使其能夠與當時

---

28 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 46.

29 信件引用自 Evgeniia Aleksandrovna Taratuta, *С.М. Стеньяк-Кравчинский —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и писатель*, p. 247. 翻譯轉引自 Lynn Ellen Pa-tyk, “Remembering ‘The Terrorism’: Sergei Stepniak-Karvchinskii’s *Underground Russia*,” *Slavic Review* 68:4 (Winter 2009), p. 770.

30 司特普尼亞克在文中對著讀者喊話：「我說出這一切，不是為了俄羅斯警察，他們不需要這些，他們對一切瞭若指掌——而是為了你，好讀者。這樣當你安靜地閱讀這幾頁的時候，你的心就不會被他們有朝一日可能在聖彼得堡，或是聖保羅的某個陰暗地牢遭受酷刑所折磨。」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 47.

蔚為風潮的英雄、偉人崇拜彼此競爭。<sup>31</sup>

司特普尼亞克撰寫該書的時間點（1881年底），俄國的「革命者」已有不少人備受公眾矚目。薇拉·查蘇利奇是其中之一，她行刺俄國警察總長特雷波夫後，雖然被判無罪，但仍遭到沙皇政府追捕，因而逃往歐洲。由於新聞報導的限制，讀者難以知曉更多革命者的生活細節，但人們渴望知道這些有名的革命者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司特普尼亞克捕捉到讀者這方面的心理。他提到薇拉經常被人以不同方式想像：「性格溫和、多愁善感的人把她描繪成一個詩意的年輕女孩，甜蜜喜悅，是一位基督教殉道者，充滿了克制與愛；傾向激進主義的人將她描繪成現代的涅墨西斯（筆者按：Nemesis，希臘神話中的報應女神），一手拿著左輪手槍，另一手拿著紅旗，口中喊著強烈的口號，可怕而傲慢，宛如革命的化身。但兩者都大錯特錯。查蘇利奇並不是冒牌激進的悲劇女主角，也沒有超凡脫俗、狂喜的年輕女孩特質。她是一個身材健壯的女人，中等身形，但是乍一看好像很高。她並不漂亮。」<sup>32</sup> 這是公眾將自身的預期與想像投射至「名人」身上的例證，為喚起讀者的好奇，司特普尼亞克將自己回憶中薇拉的形貌，與她相處交談的細節，以及略帶憂鬱、經常自省的特質呈現給讀者，彷彿薇拉曾在他們眼前活動。儘管薇拉本人並不願意成為公眾人物。<sup>33</sup>

---

31 Lynn Ellen Patyk, "Remembering 'The Terrorism': Sergei Stepniak-Karvchinskii's *Underground Russia*," *Slavic Review* 68:4 (Winter 2009), p. 771.

32 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p. 106-107.

33 薇拉曾為此寫信與司特普尼亞克表示自己不願引起公眾的興趣，但司特普尼亞克說服她，她的名字就是最能吸引人們注意的「介紹信」。

書中出現的另一位女性革命者是海珊·赫夫曼。她出生於猶太家庭，因不願忍受家庭的高壓和控制，於是離家到基輔（Kiev）當裁縫。她在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事件中出借房子給革命者製作炸藥，但是在暗殺後被捕。她當時懷有身孕，沒有與蘇菲亞等人一同被處死，而是隔年死於監獄。司特普尼亞克並不認識她，這違反了他自己宣稱的「只寫認識的人」。但他在書中表示：

然而，一個辛苦勞動，原本預期在默默無聞中度過一生的辛苦勞動者，卻被歷史浪潮帶走，並高高地載到了閃耀的浪尖上，變成全球的名人。……我自己並不認識她，然而我在這裡之所以破例，而說到我自己不認識的人，並不是為了她的名字所獲得的名聲，而是因為她的道德品質。<sup>34</sup>

他將海珊描寫成一位未受教育、容易滿足，而且懷抱著無限熱忱，充滿質樸氣息，樂於助人的女子。即使她有孕在身，也願意不計代價協助革命運動。司特普尼亞克並未提及他如何知曉海珊的性格和事蹟，但藉由這樣的描述，讀者可以看到她不惜一切投身革命的道德形象。

不過，他對蘇菲亞的描寫，與海珊和薇拉有相當大的不同。司特普尼亞克將她放在人物簡介的最後一位，鉅細靡遺介紹蘇菲亞的外貌、性格、出身、經歷與貢獻，使蘇菲亞的人物簡介更貼近「傳記」的形式。這似乎是他有意的安排。

---

Lynn Ellen Patyk, "Remembering 'The Terrorism': Sergei Stepiak-Karvchinskii's *Underground Russia*," *Slavic Review* 68:4 (Winter 2009), p. 771.

34 S. Stepiak, *Underground Russia*, p. 102.

司特普尼亞克曾在英國《泰晤士報》的一篇報導中，看見蘇菲亞·佩羅夫斯卡雅被描繪成另一名男性成員安德烈·熱里亞波夫（Andrei Zheliabov, 1851-1881）的「妾」（concubine）。<sup>35</sup> 他有意要扭轉這種印象。他在書中指出：「我們應該承認，女人是比男人更具備神火（divine flame）的。這是為什麼俄羅斯革命運動近乎宗教般的熱情，應該要歸功於她們。她們只要一加入革命運動，那便是無敵了。」<sup>36</sup> 司特普尼亞克眼中的蘇菲亞是一個「不懈而強大的戰士榜樣」（the example of an indefatigable and powerful combatant）。<sup>37</sup> 全心爲了革命事業而奮鬥。

司特普尼亞克先在開頭告訴讀者，蘇菲亞非常美麗，具有迷人的女性特質，喜愛孩子，曾經當過教師與護士，但她同時也是暗殺行動的指揮者：「這位女子，有著如此天真無邪的外表，如此甜美深情的性格，卻是恐怖組織中最令人聞風喪膽的成員之一。」<sup>38</sup> 「無害」的女性氣質與「有害」的暗殺領導者的雙重形象，形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差。<sup>39</sup> 通過

---

35 Cynthia Marsh, "The Times (1881) and the Russian Women Terrorists," *Scottish Slavonic Review* 21 (Autumn 1993), pp. 57-58. 轉引自 Lynn Ellen Patyk, "Remembering 'The Terrorism': Sergei Stepniak-Karvchinskii's *Underground Russia*," *Slavic Review* 68:4 (Winter 2009), p. 775.

36 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 127.

37 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 114.

38 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 116. 也有學者認為，他的比喻強化了「美麗」與「正義」的連結——「女人越漂亮，她做的事情越正義。」Chelsea C. Gibson, "Russia's Martyr-Heroines: Women, Violence, and the American Campaign for a Free Russia, 1878-1920" (Ph.D.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19), p. 105.

39 帕蒂克指出，這些女性氣質在西方文化的印象中具有無害的、被動的意



這層反差，他要改變人們對「弱女子」無法勝任「革命」的印象。

接著他從蘇菲亞的出身開始談起，提到她出生於俄國地位極高的貴族家庭。15歲時受俄國婦女解放運動影響，希望能出國讀書，但父親不允許，她便逃出家裡，並寫信跟父親談判。最終父親同意給她護照，而溫柔的母親則給她一筆錢讓她留學。<sup>40</sup> 司特普尼亞克竭力描寫她對革命的熱誠和投入。她在1878年曾經營救過被關押的瓦拉納斯基（Voinaralsky），此後無役不與。1879至1880年間，她與夥伴有過兩次暗殺沙皇失敗的經驗，但是蘇菲亞的行動果決沉著，同伴都十分信任她。司特普尼亞克沒有寫太多關於3月1日暗殺的細節，但卻提到俄國的帝國檢察官認為人民意志執行委員會的弱小無能，在於他們將指揮的重責大任交給一個弱女子（the feeble hands of a woman）。<sup>41</sup> 但暗殺成功的結果證明，女性並非人們以為的那樣弱小。

比起暗殺經過，司特普尼亞克更詳細描繪蘇菲亞遭到處刑的過程。他引用德國《科隆日報》（*Kölnische Zeitung*）的報導，強調該報記者對「虛無主義者」毫無同情。但是，看過行刑現場後，記者卻做出了如下的陳述：

蘇菲亞·佩羅夫斯卡雅表現出非凡的道德力量。她的臉頰甚至還保留著紅潤的顏色，她嚴肅的臉上，沒有絲毫遊街示眾的痕跡，而是充滿了真正的勇氣和無盡的反

---

涵。Lynn Ellen Patyk, "Remembering 'The Terrorism': Sergei Stepniak-Karvchinskii's *Underground Russia*," *Slavic Review* 68:4 (Winter 2009), p. 775.

40 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p. 117-118.

41 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 128.

抗。她看起來平靜而祥和，看不出絲毫的炫耀。<sup>42</sup>

他借用不同立場的報導，反襯被處刑者身上的非凡情操。

在蘇菲亞遭到處刑之後，司特普尼亞克加入了一個特別的補充。他表示，在書籍付梓之後，他從友人那裡收到了蘇菲亞寫給母親的信，認為這封信值得讀者一讀。信中，蘇菲亞請求母親不要哀痛，她會平靜地接受自己的命運。信件是當事人的私密紀錄，也是蘇菲亞自己的現身說法，讀者更能從中體會母女之間的深厚情感。司特普尼亞克讓讀者的情感收束在蘇菲亞坦然接受自己命運，且愧疚於未能好好對待母親（filial devotion）的遺憾之中。帕蒂克認為，蘇菲亞與母親的關係，表現出基督教信仰裡母與子的情感交流，而這一則母子互動的故事，不只容易讓大眾理解，也能激發起人類普遍的情感。<sup>43</sup>正是這一段描述，成為後來東亞的知識人認識「蘇菲亞」至關重要的部分，也是蘇菲亞形象轉化的關鍵點。筆者認為，司特普尼亞克將「蘇菲亞」放在一個俄國革命運動重要的位置，她所具有的美德與她的死亡，戲劇性地強化了這場革命扣人心弦的悲劇意義。

司特普尼亞克書寫的「回憶」通過書籍出版傳播到世界各地。當然，《地下的俄羅斯》並非第一本記載「蘇菲亞」其人其事的著作。俄國史學者瑪格麗特（Margaret Maxwell，1914-2007）曾提及最早關於蘇菲亞傳記的作品是1882年由俄國人民意志組成的政治「紅十字會」（Krasny Krest

---

42 報導發表於1881年4月16日，見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p. 130-131.

43 Lynn Ellen Patyk, "Remembering 'The Terrorism': Sergei Stepniak-Karvchinskii's *Underground Russia*," *Slavic Review* 68:4 (Winter 2009), p. 776.

Narodnoy Voli) 在倫敦出版的《蘇菲亞·盧沃夫納·佩羅夫斯卡雅》(Sophia L'vovna Perovskaya)。<sup>44</sup> 但翻譯得較廣，且有意識向非俄語世界讀者介紹俄國革命者的著作，仍屬司特普尼亞克的《地下的俄羅斯》。這本書很快在日本引起關注，民權家將它節選、改編為政治小說。俄國的革命者也在日本自由民權運動脈絡裡轉化為「志士」與「英雄豪傑」，成為日本的民權家對自身境況的投射。

## 二、志士與英雄豪傑：日本民權運動家的投射

《地下的俄羅斯》在歐美出版之際，日本國內自由民權運動正如火如荼進行。這場運動主要由下級武士與地方豪農發起，要求明治政府開設國會(國會期成同盟)、實施民選。運動雖以政治訴求為導向，但討論的面向涉及如何界定憲法草案中的國家型態、人民如何形塑出獨立自主精神等啓蒙問題，可說是文化整體的改造運動。<sup>45</sup> 當時知識人啓蒙民眾的手段之一，便是「政治小說」。日本文學研究者西田谷洋將

---

44 Margaret Maxwell, *Narodniki Women: Russian Women Who Sacrificed Themselves for the Dream of Freedom*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0), p. 86.

45 牧原憲夫著，臧志軍譯，《民權與憲法》(香港：中和出版，2015)，頁17-51。自由民權運動的相關研究甚多，具代表性的研究有：後藤靖，《自由民權運動の展開》(東京：有斐閣，1966)；安在邦夫、田崎公司編著，《自由民權の再発見》(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06)；寺崎修，《自由民權運動の研究——急進的自由民權運動家の軌跡》(東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研究會，2008)；安在邦夫，《自由民權運動史への招待》(東京：吉田書店，2012)；友田昌宏編著，《東北の近代と自由民權》(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17)。

「政治小說」定義為「根據自由民權思想或自由民權論的框架，以故事加以表現，或是放入寓意的物語形式文本。」<sup>46</sup> 並且指出：

雖說民權小說＝政治小說，但也包含『戲文、諷刺文、速寫、雜記、史傳、戲曲、演劇、翻譯』，並非均質的文體。……若該物語文本帶有民權的解釋，則可定義為文學史上的政治小說。<sup>47</sup>

換句話說，「政治小說」是指以詩歌、小說等各種形式創作的政治啓蒙文學。爲了使政治小說達到激起伸張民權的目的，創作者經常採用「翻案」或「戲作」的方式進行改寫，有利日本民眾快速接納政治小說內的思想觀念。<sup>48</sup>

在這場文化改造運動裡，日本知識人十分重視俄國的情況。俄國革命者在歐洲報刊上經常被稱爲 nihilist，這個詞彙隨著 1878 年薇拉·查蘇利奇暗殺警察總長事件的報導傳入日本。當《東京曙新聞》以「虛無黨」翻譯 nihilist 之後，「虛無黨」在日本廣爲傳播。<sup>49</sup> 當時，支持自由民權的論者，對

---

46 西田谷洋，《政治小說の形成：始まりの近代とその表現思想》（神奈川：世織書房，2010），頁 59。

47 西田谷洋，《政治小說の形成：始まりの近代とその表現思想》，頁 189。

48 「翻案」指的是將翻譯的原文著作「日本化」；江戶時期許多中國文學著作傳入日本，日本作家多將之改寫為日本故事，此種翻譯方式又稱爲「豪傑譯」。由於翻案小說經常是保留原情節，而場景、人名全部改寫，也有學者將翻案視爲剽竊。相關研究可見蕭涵珍，〈《剪燈新話·牡丹燈記》的傳播與改編——從《浮牡丹全傳》到《戲場花牡丹燈籠》〉，《漢學研究》，卷 36 期 4（2018 年 12 月），頁 143-174。「戲作」則指的是將政治思想結合娛樂性的讀物。見西田谷洋，《政治小說の形成：始まりの近代とその表現思想》，頁 47-59。

49 日本報社原本以音譯翻譯 nihilist 為ニヒリスト，後來意譯為虛無黨。

「虛無黨」頗感同情，如著名的知識人中江兆民（1847-1901）認為，「虛無黨」起初只是希望建立立憲政體，實施普通選舉，卻因俄國政府壓制而成爲凶暴之黨。日本政府應引以爲戒，盡快設立議會、開放民選，轉型爲民主政府。<sup>50</sup> 然而，1881年天皇頒布「開設國會敕諭」，雖然明定1890年開設國會，但主導權仍在政府。加上當時明治政府持續增稅，又碰上通貨緊縮，經濟嚴重衰退。1882年到1884年間，許多民權家視明治政府爲「自由之公敵」，陸續爆發抗爭行動，而政府對民權運動的打壓也不斷加劇。<sup>51</sup> 在此一背景下，俄國革命者的例子，正呼應了民權家的處境。

1884年9月，在警民劇烈衝突的加波山事件爆發後，曾擔任過《高知自由新聞》、《自由新聞》記者的宮崎夢柳開始將《地下的俄羅斯》翻譯改寫成《鬼啾啾》。<sup>52</sup> 小說的〈緒言〉裡，宮崎夢柳提及這本書帶給他的靈感和心得：

余日前撰著《佛蘭西革命記・自由凱歌》、《一滴千

見高橋矩正，〈論日魯兇黨〉，《東京曙新聞》（東京），1878年11月21日，第3版。將 nihilist 翻譯爲「虛無黨」，可能是受到「朋黨」、「君子不黨」觀念影響，也有強調暗殺暴徒成群結黨的批評意味。

50 中江兆民，〈過激ノ政黨ハ專制政體ノ下ニ生ズ〉，《自由新聞》（東京），號55（1882年9月7日）。轉引自中江兆民著，松永昌三編，《中江兆民集》（東京：筑摩書房，1974），頁241。

51 民權家的抗爭，見寺崎修，《自由民權運動の研究》，頁3-26。

52 《鬼啾啾》標題取自杜甫〈兵車行〉：「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宮崎從1884年12月開始在自由黨的機關誌《自由燈》上連載。1885年10月，連載的文章集結爲單行本。不過，書籍問世後遭政府宣布禁止發售。谷川惠一，〈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解題〉，收入宮崎夢柳，《リプリント日本近代文学81・虛無黨實傳記 鬼啾啾》（東京：平凡社，2007），頁247-254。禁止發售的新聞，見〈鬼啾々の裁判〉，《東京日日新聞》（東京），1886年3月17日，第6版。

金·憂世涕淚》等諸篇，公諸於世，幸未辱讀者之褒獎。復欲書其他政治之稗史，卻苦無好材料。頃日偶得一書題為《地底之秘密》，此書面向全世界，記述俄國虛無黨之情形，喚起人們的注意，予人至大至強之感觸。……其說精確切實，全非妄加揣摩推測，描繪虛無黨社會之奇事異聞，迷惑讀者之類。且該書揭示該黨領袖之詳傳，讀後宛若親身到俄國與虛無黨人相往來，知悉其事況。其行文慷慨激烈，字字尖銳，一針見血。見之余感嘆不能止，直欲將全篇譯出，心又竊憚不能果，遂拔萃敷衍篇中二三人之事跡，且與近日西文新聞之傳湊合，重起此稿。<sup>53</sup>

宮崎之所以能取得《地下的俄羅斯》，日本學者柳田泉（1894-1969）猜測是由自由民權運動政治家板垣退助（1837-1919）於1882年赴歐考察攜回後在民權家手上流傳。<sup>54</sup> 由於支持自由民權的知識人屢屢遭受政府打壓，司特普尼亞克的書寫引發同為民權家的宮崎夢柳很深的感觸——他一方面認同這本書作為俄國革命歷史證據的權威性（全非妄加揣摩推測……迷惑讀者）；同時產生了身歷其境的感受（宛若親身到俄國與虛無黨人相往來）。而他所敷衍的「二三人之事跡」，即是司特普尼亞克在前言提到的3個革命者——克魯泡特金、薇拉·查蘇利奇與蘇菲亞·佩羅夫斯卡雅。書中雖然也出現了利索古、奧辛斯基等人，但他們

53 宮崎夢柳，《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收入山田有策、前田愛注釋，《日本近代文學大系2·明治政治小說集》，頁50-51。

54 柳田沒有明確的證據，但根據板垣出訪歐洲的時間來看有此可能。板垣退助在1882年險遭暗殺，遂與後藤象二郎出走歐洲，見柳田泉，《政治小說研究》（東京：春秋社，1935），卷上，頁201。

卻經過宮崎相當程度地「改造」——擁有多座森林、城堡的富有貴族利索古成了地方的商人，還生了一位虛構的女兒阿雷依（アレイ）。奧辛斯基則成了與克魯泡特金一同逃獄的虛無黨員「布蘭德涅爾」（プラントネル）的人物原型。<sup>55</sup>

筆者不能完全確定宮崎夢柳選擇人物的動機，但對照當時市面上流通的書籍與新聞報導，克魯泡特金的著作曾被翻譯。<sup>56</sup> 薇拉·查蘇利奇則是頻繁見於日本各報上。<sup>57</sup> 蘇菲亞暗殺亞歷山大二世一事，宮崎夢柳也曾在他 1884 年改寫出版的政治小說《憂世涕淚：一滴千金》裡提及。<sup>58</sup> 顯示出這 3 位革命者與相關的事件在日本已為人所熟知，以其為主要角色，或能更快讓讀者進入故事所要傳達的旨趣。

《鬼啾啾》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一至四回，提要說

- 
- 55 宮崎夢柳的「創造」，山田有策有過詳細的考證與分析，布蘭德涅爾確有其人，但已在 1879 年被逮捕處死。其原型可能參考司特普尼亞克對奧辛斯基的描述，以及蘇菲亞的戀人安德烈·熱里亞波夫。但奧辛斯基實際上與克魯泡特金的逃獄並無關聯。見宮崎夢柳，《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收入山田有策、前田愛注釋，《日本近代文學大系 2·明治政治小說集》，頁 100。
- 56 1882 年安東久治郎（又名安東久次郎，1867-1932）就曾翻譯克魯泡特金介紹虛無主義者的一篇文章為《露國虛無黨的由來》。見安東久次郎譯述，《露國虛無黨ノ由來》（東京：東雲館藏，1882），頁 1。
- 57 1878 年她暗殺特雷波夫後，日本《東京日日新聞》在 5 月就報導「婦人ウエラサツソリッチ」受審的經過。見〈電報：4 月 17 日聖彼得堡發〉，《東京日日新聞》，1878 年 5 月 17 日，第 3 版。此外，杉田策太郎也曾翻譯《芝加哥論壇報》關於薇拉審判的報導為《烈女ノ疑獄：魯國奇聞》（東京：由己社，1882）。此書後來成為宮崎夢柳改編《鬼啾啾》的材料之一。
- 58 在這本政治小說裡，宮崎提及蘇菲亞·佩羅夫斯卡雅暗殺亞歷山大二世一事。見宮崎夢柳，《憂世の涕淚・一滴千金》（東京：成文舍，1884），卷 2，頁 25。

明俄國革命運動的過程；第二部分五至六回，講述薇拉·查蘇利奇暗殺特雷波夫事件與審判經過；第三部分七至九回，以虛構角色阿雷伊為主角，敘述她幫助克魯泡特金、布蘭德涅爾逃出監獄的經過；第三部分十至十二回，描寫蘇菲亞暗殺沙皇的歷程。這三個部分正好依照時序進行。最後也以蘇菲亞給母親的信件作結，但加入了宮崎夢柳個人對俄國社會動盪的感慨。<sup>59</sup>

誠如日本學者齋藤希史所指，當時許多翻譯自西方著作的政治小說，除了採取以平假名相混的訓讀體書寫之外，經常使用大量的中國漢籍典故與才子佳人的框架和修辭。<sup>60</sup> 舉例來說，宮崎所描繪的「薇拉」外貌，呈現出了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佳人典型：「柳眉桃頰嬌，一見可知為 20 餘歲之娘子。」<sup>61</sup> 「阿雷伊」則是「生得美麗妖豔，無可匹敵。」<sup>62</sup> 「蘇菲亞」更是「生得美麗妖豔超群，初見雖不覺美，若凝神細看，則其婀娜之姿，如何鐵石心腸之人也將心蕩魂奪。秀眉清眸，鼻樑高，溫柔中有威嚴，朱唇皓齒，如翠山之月出，籬中之花開。」<sup>63</sup> 「外貌美麗」成為虛無黨女革命者共通的

---

59 敘述完蘇菲亞行刑過程後，宮崎呼應著標題《鬼啾啾》，感慨道：「嗚呼何時此不吉不祥之光景能夠一變，啾啾鬼哭全絕，俄國官民之間臻於靄然和氣之風？想來極欲嘆息。」宮崎夢柳，《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收入山田有策、前田愛注釋，《日本近代文學大系 2·明治政治小說集》，頁 159。

60 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臺北：群學出版，2020），頁 162。

61 宮崎夢柳，《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收入山田有策、前田愛注釋，《日本近代文學大系 2·明治政治小說集》，頁 83。

62 宮崎夢柳，《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收入山田有策、前田愛注釋，《日本近代文學大系 2·明治政治小說集》，頁 116。

63 宮崎夢柳，《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收入山田有策、前田愛注釋，



特徵。越智治雄認為，宮崎對俄國虛無黨「美人」的印象，可能來自《高知新聞》上描述虛無黨婦人「容顏如花，肌膚如玉，絕世之美女。」的描述。<sup>64</sup> 他遂將這些描述以古典文學佳人典型的形式描繪出來。

而《鬼啾啾》所描述的蘇菲亞，更可看到才子佳人文學框架的展現。美麗的佳人蘇菲亞在遇見布蘭德涅爾後，萌生了戀情。<sup>65</sup> 但是，與古典才子佳人小說不同的是，政治小說旨在傳達政治與國家大事。在宮崎夢柳的改寫裡，沉浸在「戀情」中的蘇菲亞幡然悔悟，體悟到「戀」終究是個人私情，更重要的是為「眾人」犧牲的理想：

一旦迷於此情天之雲霧，溺居於此色海之波瀾，忽而悔悟之心生，蘇菲亞熟思之，我誤也，誤也！與其愛憐一人而為其犧牲，不若愛憐同胞千萬人。<sup>66</sup>

在這裡，可見宮崎夢柳如何創造「蘇菲亞」形象的跨文化轉化。司特普尼亞克並未在《地下的俄羅斯》裡深入描寫蘇菲亞的戀情。但宮崎夢柳卻設計了一段蘇菲亞的愛戀，並讓她自己斷絕了男女之情。換言之，男女之情，是對一人的

《日本近代文學大系 2・明治政治小說集》，頁 126。司特普尼亞克原句：「She was beautiful. It was not the beauty which dazzles at first sight, but that which fascinates the more, the more it is regarded.」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 115.

64 新聞出處《高知新聞》（高知），1881年6月30日。轉引自越智治雄，〈地底の夢柳〉，《日本文學》，卷22期7，頁10。

65 宮崎夢柳以漢光武帝與陰麗華夫妻的典故加以比喻。光武帝的典故，宮崎原文為：「才子多恨之願，非陰麗不娶。美人可憐之心，必王昌而嫁。」宮崎夢柳，《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收入山田有策、前田愛注釋，《日本近代文學大系 2・明治政治小說集》，頁132。

66 宮崎夢柳，《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收入山田有策、前田愛注釋，《日本近代文學大系 2・明治政治小說集》，頁132。

忠貞，而捨身為同胞，則是對人民的忠貞。當蘇菲亞壓抑「自己的戀情」，以實現對「眾人的愛憐」。「佳人」得以成為與男性相仿，為了貫徹理念不惜犧牲生命的「女志士」。<sup>67</sup>

此外，宮崎筆下的「蘇菲亞」，還具備「英雄」與「豪傑」的資質。《鬼啾啾》裡描述「蘇菲亞」暗殺亞歷山大二世後，談笑自若，毫無懼意：

那麼這個兇徒之首腦是誰？便是虛無黨中眾所皆知的女英傑蘇菲亞·佩羅夫斯卡亞。蘇菲亞做了大事之後，實在膽大包天，毫無忌憚，仍滯留於都城，……毫不掩飾犯罪的痕跡，臉色舉止都與平常無異，談笑自若，見聞於此，從法官到相關人等，都認為她雖是敵人，卻是讓人震驚的人物，而在心中隱密地嘆服其氣魄的剛勇。<sup>68</sup>

這一段在司特普尼亞克的描寫裡，呈現的卻是她面對審判的平靜與謙遜：

她在3月13日一週後被捕。因她無論如何不會離開首都。她出現在法庭上，平靜而嚴肅，沒有一絲炫耀

---

67 湯薇薇，〈佳人〉から「女志士」へ——宮崎夢柳の『鬼啾々』『芒のひと叢』を中心に——，《國際日本文學研究集會會議錄》，號29（2006年3月），頁155-162。「志士」一詞，在《論語·衛靈公》已可看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江戶末年日本遭遇西方列強，為實現救國主張，武士階層可能喪命，因此彼此常以「志士」相稱。相關研究可見島田英明，《歷史と永遠：江戶後期の思想水脈》（東京：岩波書店，2018）。此外，柯惠鈴曾指出「男女關係」與「家國之情」之間的共通性在於濃厚的「志士」情懷。柯惠鈴，《民國女力：近代女權歷史的挖掘、重構與新詮釋》（臺北：臺灣商務，2019），頁393。

68 宮崎夢柳，《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收入山田有策、前田愛注釋，《日本近代文學大系2·明治政治小說集》，頁154。

或賣弄的痕跡，既不為自己辯護，也不以自己為榮。就像她以前的生活一樣，簡單而謙虛，就連她的敵人也被感動了。<sup>69</sup>

「志士」是能為理念犧牲之人，「豪傑與英雄」則是才智表現過人之入。日本思想史學者渡邊浩曾指出：「豪傑」見於《孟子》，指的是有過人才智的不凡之人。而「英雄」見於《漢書》、《三國志》中，指稱驅策群眾，有領導力，且胸懷大志，具有謀略機智的人。英雄與豪傑，是源自中國傳統文史著作，但在明治時期，「英雄豪傑」結合了江戶時期武士的男子氣概，與西方英雄的政治能力與競爭力，而成為新時代風雲人物。<sup>70</sup> 齋藤希史也認為：政治小說雖然運用「才子佳人」的框架，但故事裡的角色往往具有理性判斷、擅長政治演說的形象，更接近一位西方概念的「英雄」。<sup>71</sup> 上述引文中「蘇菲亞」展現的無畏氣魄、大膽行事風格，正反映出民權家通過「近代英雄豪傑」的想像，轉化「蘇菲亞」，使之貼近日本文化對革命人物的想像，同時寄託民權家的政治期許。<sup>72</sup>

---

69 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p. 128-129.

70 相較之下，「英雄」更帶有政治、軍事的意涵，不過後來逐漸融合為「英雄豪傑」。危機的時期容易產生「英雄豪傑」。渡邊浩，《明治革命・性・文明——政治思想史の冒險》（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21），頁 266-267。

71 齋藤此處引用的是矢野龍溪（1851-1931）《齊武名士・經國美談》，他指出裡面的主角既有政治家演說的才華，又有理性思考能力與觀察眼光，而不只是傳統中國文學中的英雄。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頁 175。

72 越智治雄認為，宮崎夢柳是通過蘇菲亞，在幾乎被剝奪政治權力的現實裡，以想像力奪回政治上的行動。越智治雄，〈地底の夢柳（二）〉，《日本文学》，卷 22 期 12，頁 71。

宮崎夢柳特意選用女性作為主角，也有刺激男性讀者勇於參與政治改革的目的。繼《鬼啾啾》之後，宮崎夢柳又創作了《芒之一叢》（芒の一と叢，1888）。在這本小說裡，宮崎以「書中書」的方式，讓「蘇菲亞」成為日本婦女的啓蒙者。故事描述日本武士家庭出身的兒島文子，讀了以「蘇菲亞」<sup>73</sup> 為主角的故事〈虛無黨事情的冊子〉後深有共鳴，與志向相同的三浦卓結婚前往歐洲。夫妻兩人以虛無黨員的身分參加了暗殺俄國陸軍中將的行動，不幸戰死，他們的兒子三浦秀繼承了兩人的意志，成為虛無黨的少年領袖。小說最後藉由三浦秀的演說，提到母親追求自由權利的義烈之情：

諸君，知道此觸躄為何人嗎？這只是東洋之一婦女，但卻是為了回復諸君被蹂躪的權利、被褫奪的自由而死的觸躄，豈非義且烈哉！若諸君能為此義且烈之事，立刻奮發興起，則九原之下，此觸躄亦將欣然一笑……。<sup>74</sup>

日本男性視為柔弱卑屈的「東洋之一婦女」，卻因爭取權利與自由而死，也在刺激著「男性讀者諸君」投身追求自由與民權的行動。《芒之一叢》以「蘇菲亞」作為婦女啓蒙的人物，也說明司特普尼亞克所建構的「蘇菲亞」形象與日本文化理想志士典型之間的相應性。

### 三、虛無黨女傑：近代無政府主義史的人物

---

73 小說內人名為「蘇比亞」，本文統一以「蘇菲亞」稱之。

74 宮崎夢柳，《芒の一と叢》（大阪：駸駸堂本店，1888），頁132。

隨著 1887 年明治政府陸續頒布《保安條例》與《新聞條例》、《出版條例》修正，日本的言論自由受到很大的限縮，政治小說創作逐漸減少。<sup>75</sup> 不過，關於虛無黨、社會黨，以及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議題的討論並未停歇。1890 年代至 1900 年代初期，日本政治界、學術界開始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把握這些思潮，以釐清俄國、歐洲出現暗殺或政治革命事件的根本原因。日本思想史學者梅森直之指出，「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潮幾乎是同時傳入日本，但知識人對這兩股思潮研之甚詳，絕非混亂、不成熟的理解。<sup>76</sup> 這可以從當時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著作中獲得佐證。1899 年任職於農商務省的福井準造（1871-1937）出版《近世社會主義》，解釋社會主義出現的原因。<sup>77</sup> 1901 年兩位日本政治家安部磯雄（1865-1949）、島田三郎（1852-1923）陸續出版《社會問題研究法》、《社會主義概評》。<sup>78</sup> 隔年，日本早稻田大學歷史學者煙山專太郎也出版《近世無政府主義》，試圖理解俄國革命者為何會採取暗殺等暴行。<sup>79</sup> 這些

---

75 訖島巨，〈ロシヤ虚無党文学の系譜：宮崎夢柳『虚無党実伝 鬼啾啾』への道程〉，《文学史を読みかえる・論集》，期 2（2014 年 8 月），頁 64。

76 梅森直之，《初期社会主義の地形學——大杉榮とその時代》（東京：有志舎，2016），頁 14-15。

77 福井準造，《近世社會主義》（東京：有斐閣，1899），頁 262-263。這本書後來也翻譯到中國，見福井準造著，趙必振譯，《近世社會主義》（上海：廣智書局，1903）。

78 安部磯雄，《社會問題解釈法》（東京：東京專門學校，1901）、島田三郎，《社會主義概評》（東京：警醒社，1901）。

79 據其序言，煙山自述撰作此書的意旨：「近代無政府黨暴行之慘烈，聞之令人膽寒。但世人多知其名而不知其實，因此本書即為此而作，或可聊備一格。」煙山專太郎，〈序言〉，《近世無政府主義》（東京：東

書籍詳論思潮出現的社會狀態、各自的主義和實施手段。其目標都試著以客觀的角度，說明思潮、革命出現的原因。

煙山撰寫《近世無政府主義》羅列了 30 本參考書目，顯示其對俄國虛無主義、革命運動知識來源的依據與歷史研究基礎。<sup>80</sup> 值得注意的是，司特普尼亞克的《地下的俄羅斯》與《俄羅斯的暗雲》名列其中。

《近世無政府主義》分為二個部分：前一部分討論俄國虛無主義的起源、發展與演變；後一部分梳理歐洲的無政府主義的勢力。煙山討論俄國的篇幅非常多，主要因為當時日本知識人認為，無政府主義是根植於俄國社會的理論，虛無主義則是隸屬於無政府主義的一股思潮。<sup>81</sup> 若能了解作為「社會病症」的無政府主義，也許能讓暗殺暴行不要再發生。<sup>82</sup> 書中敘述了俄國民粹主義革命的始末，也譯出俄國「人民意志」上書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1845-1894）的請願書全文，描述他們建立自由民主國家的渴望。<sup>83</sup>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全書對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抱持批判立場，但是煙山卻給予反抗專制、爭取自由的俄國虛無黨頗為正面的

---

京專門學校，1902），頁 1-2。李冬木對煙山專太郎的無政府主義著作及其求學過程有所詳述，見李冬木，《魯迅精神史探源：個人·狂人·國民性》（臺北：秀威，2019），頁 107-112。

80 30 本書目中多為法、德、俄國作者的著作。因篇幅限制，30 本書目不一列舉，此舉 3 本為例：Joseph Dippel, *Der russische Nihilismus* (Passau: Waldbauer, 1882), Gregor Kupczanko, *Der Russische Nihilismus* (Leipzig: Verlag von Wilhelm Friedrich, 1884), Jean Bourdeau, *Le Socialisme allemand et le Nihilisme russe* (Paris: F. Alcan, 1892).

81 梅森直之，《初期社会主義の地形學——大杉榮とその時代》，頁 14。

82 煙山曾提到無政府主義被視為社會的一種病症。見煙山專太郎，〈序言〉，《近世無政府主義》，頁 1。

83 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頁 171-180。

評價。尤其，煙山專門列出「虛無黨女傑」一章，介紹參與俄國女革命者。

此處還要特別說明關於「女傑」的現代轉化。自由民權運動時期，宮崎夢柳曾以「女豪傑」稱呼「蘇菲亞」。當時的「豪傑」概念不僅有中國古典經籍中所謂「才智過人之人」，還包含武士男子氣概與西方英雄卓越政治能力的理想人物形象。在日本自由民權運動所訴求的政治改革裡，爲了追求平等、自由的政治體制，而不得不採取暗殺革命的「女豪傑蘇菲亞」，正可謂追求理想而不惜犧牲生命的典範人物。煙山使用的「女傑」，正延續了上述的概念和內涵。進一步說，這裡的「女傑」，就不只是當時教育家三輪田真佐子（1843-1927）所強調的，對家庭、社會、國家盡責任義務，良妻賢母般的「女傑」；<sup>84</sup> 而是與男子一同追求自由的（特別是以西歐、美國爲榜樣的）、不受專制政權壓迫的「女傑」。

正因如此，煙山在綜述俄國參與革命女子眾多的特殊現象時，<sup>85</sup> 特別強調參與的女子不僅不在意穿著打扮，甚至仿

---

84 日本教育家三輪田真佐子在《女子教育要言》裡提到：「特別是一般的女子有著強烈情感，讀了良妻賢母的傳記，或是看了貞婦烈女的肖像，經常在不知不覺間，感受到同樣的情感、同樣的志向，並且與她並駕齊驅，若對此效果加以運用，也可助增進女德。……那麼，今日修養女德的首要之務，是除了感人流淚的歷史事蹟之外，以女傑的傳記爲根據，無論日本、中國、西洋，全部加以女教之精粹與真知灼見、我國的國情與當前的時局，出版爲教科書。且女學校的倫理講堂等場所，掛上足以瞻仰模範的女傑畫像，女學生日日見之，更感欽慕。若該校前輩女學生中，有足以嘆賞之成績者，也掛上她的肖像，獎勵後進之女學生。」，《女子教育要言》（東京：國光社，1897），頁63。中文爲筆者翻譯。

85 煙山原文爲：「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出現的女性人數甚少，到底不能與虛無黨的女傑相比。她們（案：指虛無黨女員）之中有年老、年輕、醜陋者，而又有二三非常之美人。其家世有貴族、高官、富豪、農民，更多

效男子裝扮，都是爲了能夠實現理想國的緣故：

巴枯寧稱女員如貴重寶物。她們讀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又研究西歐的社會主義，主張自己的位階地位甚高，不自稱女人，而稱他人女人。其中如蘇菲亞·佩羅夫斯卡雅，曾公然憚言男子比女子劣等。她們的服裝又與常人異。著泥垢滿布的黑色短衣，穿褲的時候必定使用皮帶，戴著沾滿塵土的帽子、掛著青色的眼鏡。蓋為改變其容貌姿態之故。特別是躬行理想論的激烈婦人，全無男女的區別，往往剪髮圓頂，抽捲菸草，一切仿效男子行為而得意。

……要之，這些女員毫不在意衣服身體的裝飾，對於破敝的衣帽不甚在意。要說為什麼？那是因為她們除了心中之理想國能夠實現之外，再無其他任何慾望。她們便是如此與其他男員共同從事「事業」（案：即革命）。飲食、居住經常都在一起，而絕無紛亂之男女關係。此正是她們這般兇行暴亂的虛無黨，卻有極為潔白清廉的個人道德之故。<sup>86</sup>

煙山詮釋女革命者爲目標，棄各種慾望，包括男女之情。而且是以既非男，也非女（不自稱女人）的「去性化」（desexualized）特徵，與男性成員共同從事「事業」。<sup>87</sup>

---

是妙齡的女學生。」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頁244。根據俄國史家斯蒂茨（Richard Stites, 1931-2010）的粗估，參與民粹主義革命的俄國婦女，比例約占總人數的20%至33%左右。Richard 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49-150.

86 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頁249-251。

87 本文所謂「去性化」（desexualized），指的是消除或最小化性的聯想



接著，煙山介紹了 6 位被同黨稱為「聖徒」的女子：薇拉·查蘇利奇、蘇菲亞·佩羅夫斯卡雅、海珊·赫夫曼、娜塔莉亞·阿姆菲爾德（Natalia Armfeld, 1850-1887）、蘇菲亞·羅森·赫茲菲爾德（Sophia Löscher von Herzfeld，生卒年不詳）、薇拉·芬格（Vera Figner, 1852-1942）。耐人尋味的是，煙山只列出了前 3 人的略傳。沒有太多明確的證據能解釋煙山選擇人物的動機，但是這 3 人的略傳，卻與司特普尼亞克《地下的俄羅斯》所簡介的 3 位女性革命者完全重疊，內容也是由該書簡化而來。這或許可以間接說明煙山將這本書視作理解過去革命者形象的參考依據。而這一點，也顯示出作為革命者「回憶錄」的《地下的俄羅斯》，如何在出版 20 年後，展現其作為歷史材料的權威性。

在人物略傳先後的安排上，煙山並沒有依照司特普尼亞克的順序。而是依序介紹薇拉、蘇菲亞與海珊。這或許是出自對歷史時序先後的考慮，薇拉的暗殺事件發生於 1878 年，蘇菲亞的暗殺則是在 1881，而海珊的死亡則是在 1882 年。由於是略傳，煙山並未完全照譯司特普尼亞克的文字，而是將之重新敘述。從重述裡可以看到煙山側重的面向和選擇。比如講述薇拉的外表和舉止：「她雖不美，但風姿瀟灑清新。平時沉鬱，但一開口討論，她的聲音會讓全場吃驚。」<sup>88</sup> 這一段司特普尼亞克則是描述得宛若親見：「她並不漂亮。她眼睛形狀很好，……她常常沉思，而且有些悲傷。……然而，有一件事甚至比她的外表更不符合人們對一個脫俗少女

---

或是吸引力。見許慧琦，〈去性化的「娜拉」五四新女性形象的論述策略〉，《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0（2002 年 12 月），頁 59-101。

88 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頁 253。

(ethereal young girl) 的想像，那就是她的聲音。一開始，她像大多數人一樣說話，但這種初步狀態持續的時間非常短暫。一旦他的話變得有活力，她就會提高嗓音，說話的聲音大得就像她在對一個半聾的人或者至少距離1百碼遠的人說話。」<sup>89</sup> 顯而易見的，文學性的描述，以及在《地下的俄羅斯》裡那些使讀者身歷其境的表達，被煙山所排除了。

但是，從篇幅的長短，還是可以看到煙山所重新敘述的傳記，一定程度受到《地下的俄羅斯》文體影響。司特普尼亞克描述薇拉和海珊的篇幅並不長，他並未按照嚴謹的傳記格式書寫她們的簡介，更加著重在她們的日常生活片段。但是他對「蘇菲亞」的描寫，則近乎一部內容完整的傳記。筆者認為這是煙山重述「蘇菲亞」傳記時，篇幅長於另外兩人的主要原因。

煙山根據司特普尼亞克的介紹重述「蘇菲亞」的事蹟。他簡明扼要指出蘇菲亞父親「嚴峻壓制」，母親「溫良慈愛」，父親反對她求學與交友，她因此離開家，溫柔的母親則資助她學費求學。煙山刪去了蘇菲亞與父親談判，父親最後妥協而給她護照的部分。<sup>90</sup> 或許是因為父親的「妥協」會降低父女衝突的張力。

因為母親的幫助，使得蘇菲亞能夠求學。這一層描述至關重要，它彰顯了蘇菲亞與母親之間緊密的親子互動，也更

---

89 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p. 108.

90 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頁254。有趣的是，宮崎夢柳雖然有所改寫，但沒有刪去這個部分。宮崎夢柳，《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收入山田有策、前田愛注釋，《日本近代文學大系2·明治政治小說集》，頁128-129。

能夠說明蘇菲亞在最後寫信給母親至情至性的表現。<sup>91</sup> 煙山沒有省略這些部分，他甚至加入連宮崎夢柳都未曾特別強調的特質——「性至孝」：

蘇菲亞性至孝，其無論身處如何的境遇，也不能忘記母親瓦爾拉。屢屢不顧警吏的嚴格偵查，試著前去見母親。<sup>92</sup>

如同帕蒂克的研究所指，蘇菲亞臨刑前給母親的信件，表現了基督教中母與子之間的緊密聯繫，而能在基督教信仰的語境之中獲得普遍的共鳴。但當這樣的互動，進入到以儒家文化為根柢的東亞世界，煙山取用了「孝」的概念作為蘇菲亞與母親關係的詮釋。

「性至孝」的用法，事實上並非煙山首創。明治時代的人物傳記經常可見以「性至孝」讚揚子女照顧、敬愛或思念父母的行為表現。<sup>93</sup> 然而，此一置換，反而擴大，或改變了「孝」的概念內涵。子女即便不在父母身邊、不順從父母（蘇菲亞的離家），也仍然能夠稱之為「孝」。他讓女兒對母親懷抱的深厚情感，成為「孝」的表現之一。但反過來說，這層轉譯，也可能讓「蘇菲亞」披上了傳統婦女美德的形象。胡纓即是這麼解讀中國「蘇菲亞」傳記中「孝」的使用：「為了進一步突出索菲亞的柔情，傳記引用了她在獄中致母親的

---

91 煙山節譯出蘇菲亞給母親的信件：「兒此次之命運為原本所期，貫徹自我信念而至於此，無所怨亦無所悲。兒終究不忍扭曲此信念，只是比起命運，願母親寬赦兒令母親哀痛之罪。」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頁 257。

92 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頁 256。

93 如 1878 年小島玄壽《日本列女傳》，稱各種事奉父母的女子「至孝」。見小島玄壽編，《日本列女傳》（東京：山中八郎，1878），卷 1，頁 4。

家書……這使得打破舊習的無政府主義者與那些具有傳統美德的婦女接近了。」<sup>94</sup> 無論如何，煙山所轉化的「蘇菲亞」形象，確實滿足了日本或中國讀者對於女性革命者特質的想像：美麗、<sup>95</sup> 貞潔（潔白清廉的道德）、孝（性至孝）、臨死不懼。

「蘇菲亞」的傳記，曾讓參與日本社會主義活動的管野須賀子（1881-1911）大為感嘆，據說她在讀了煙山專太郎的《近世無政府主義》之後：「彷彿被俄羅斯女性革命家蘇菲亞·佩羅夫斯卡雅炸彈暗殺亞歷山大二世奪去了心魂。」<sup>96</sup> 而這也正是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的弔詭之處。批判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革命暗殺，寄望矯正此「社會病症」的歷史研究著作，反而成爲日本追求「自由理想國」的人們仿效的對象。<sup>97</sup> 這顯示司特普尼亞克根據回憶所描繪的革命者形象具有強大的政治宣傳效果。他相當有意識地呈現俄國革命運動的「正義」性。而當他所描寫的革命者「蘇菲亞」形象，與俄國革命的歷史權威性結合，進入歷史學術著作中，革命歷史上的人物「蘇菲亞」也儼然成爲希望改變政治

---

94 胡纓著，龍瑜宸、彭姍姍譯，《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頁132。這裡她所討論的傳記為任克，〈虛無黨女傑沙勃羅克傳〉，《浙江潮》（東京），期7（1903年9月），頁115-120。

95 「她是虛無黨中的美人，纖瘦容貌頗富魅力。笑時恰如孩童，且其年雖二十五、六，風姿舉動尚如妙齡少女，不多修飾，毫不在意衣服是否合身。但其個性厭惡不潔，最喜歡小孩。」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頁259。

96 此時期為1908年前後。清水卯之助，〈小伝〉，收入管野須賀子，《管野須賀子全集》（東京：弘隆社，1984），集3，頁310。

97 梅森直之，《初期社会主義の地形學——大杉榮とその時代》，頁39-40。此外，李冬木也提到煙山此書對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見李冬木，《魯迅精神史探源：個人·狂人·國民性》，頁118-119。

體制的革命典範人物。

隨後，《近世無政府主義》傳入中國，很快成爲中國革命黨宣揚擺脫專制、追求現代政治理想論述的參考讀物。<sup>98</sup>而「蘇菲亞」與「虛無黨女傑」的形象，也進入了中國的文化脈絡。

#### 四、「女豪傑」形象的承繼與轉化： 反清與無政府主義革命者

中國知識人對俄國民粹主義革命運動的強烈興趣，約於1902年前後展開。事實上，俄國革命運動發展最激烈的1880年代，中國國內的《萬國公報》、《申報》都曾介紹過 nihilist 的革命行動（翻譯爲尼加利、尼赫力斯特、希利尼等各種音譯名），但多以亂黨、逆黨等態度批判，<sup>99</sup>並未引起廣泛的關注。<sup>100</sup>直到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爲（1858-1927）、梁啓超（1873-1929）逃至日本，從日本的報刊上獲知更詳細的俄國革命運動始末；再加上前往日本留學的中國學子、革命黨人數漸增，日本對「虛無黨」的介紹，很大程度影響了中國知識人對虛無黨的印象。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即是《近世無政

---

98 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94），頁48-49。

99 如：〈各國近事：大俄國尼黨逆書〉，《萬國公報》（上海），期581（1880年3月26日），頁270；〈論俄國尼希利士黨人放火事〉，《申報》（上海），1880年11月16日，第1版；〈書俄主嚴防逆謀事〉，《申報》，1881年7月22日，第1版。

100 賴芳伶，〈清末小說《東歐女豪傑》析論〉，《文史學報》，期23（1993年3月），頁66。

府主義》的出版。

此書自問世到 1907 年間，至少有 18 篇譯述該書的文章發表於改良派與革命派的報刊。<sup>101</sup> 由於作者多以筆名發表，較難確知其身分，但有些仍然能夠判斷譯者身分，如：筆名淵實的廖仲愷（1877-1925）以及傾向無政府主義的張繼（1882-1947）。《近世無政府主義》被譯述最多的是第三章「革命運動的歷史」與第六章「虛無黨女傑」，其中以「蘇菲亞」為主的傳記至少有 4 篇。<sup>102</sup> 但薇拉·查蘇利奇或海珊·赫夫曼傳記則未見。不過，在其他著作中仍然能夠找到海珊與薇拉的身影。比如說金天翮（1873-1947）與曾樸（1872-1935）合著《孽海花》（1904）中的角色「海富孟」：

原來夏雅麗姓游愛珊，俄國閔司克州人，世界有名虛無黨女傑海富孟的異母妹。……直到 1881 年 3 月，海富孟隨蘇菲亞趁觀兵式的機會，炸死俄皇亞歷山大。海氏、科氏同時被捕於泰來西那街爆藥製造所，

101 狹間直樹（1937-）已指出：當時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創辦的地方刊物（如：《浙江潮》、《江蘇》）、革命黨機關誌《民報》等，都擷取該書推翻專制的部分進行轉譯。狹間直樹，《中國社會主義の黎明》（東京：岩波書店，1976），頁 115。李冬木曾統整列出 18 種譯述著作，也包括《新民叢報》。見李冬木，《魯迅精神史探源：個人·狂人·國民性》，頁 115-117。中國之新民（梁啟超），〈論俄羅斯虛無黨〉，《新民叢報》（橫濱），期 40、41 合刊（1903 年 11 月 2 日），頁 59-75。

102 分別是〈弑俄帝亞里山德者傳〉，《大陸報》（上海），期 9（1903 年 8 月），頁 25-33；任克，〈俄國虛無黨女傑沙勃羅克傳〉，《浙江潮》，期 7，頁 115-120；大我，〈蘇菲亞傳〉，《唯一趣報有所謂》（香港），1905 年 6 月 9 日、1905 年 6 月 10 日、1905 年 6 月 19 日；淵實（廖仲愷），〈蘇菲亞傳〉，《民報》（東京），期 15（1907 年 7 月），頁 119-125。4 篇的內容都是譯自《近世無政府主義》。

受死刑。<sup>103</sup>

海富孟即是「赫夫曼」。雖然她實際上並未直接參與暗殺行動，但作者仍將她改寫成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要角之一。

薇拉則以「韋拉」之名，出現在馬君武（1881-1940）《俄羅斯大風潮》：

偉哉！俄羅斯之女豪傑韋拉沙嫂麗支 Vera Sassouhitch 也。可與法蘭西之救國女豪傑貞德 Ienme d'arc（筆者按：Jeanne d'Arc）並美矣！韋女傑何以奇？奇其以一小女子挺身殺死將軍特累剖夫 Trehoff，遂以鼓動全俄國之人心，而大振殺人流血之風也。……何獨韋女傑殺一將軍而舉國憐之，於此見人情之所趨。婦人女子盡力國事，較之男子尤愈易也。<sup>104</sup>

馬君武在這本小冊子也稱蘇菲亞為「俄羅斯女豪傑」，並且以相當簡略的（且帶有一些想像與錯誤成分的）方式介紹蘇菲亞：「薛菲亞培婁屋司加牙，薛女傑貴族也，甚美，被面障引數人入見俄帝，擲以炸彈，俄帝立死。」<sup>105</sup> 馬君武

---

103 曾樸，《孽海花·第十六回》（臺北：桂冠，2002），頁152。

104 《俄羅斯大風潮》譯述自克喀伯（Thomas Kirkup）《社會主義史》（*A History of Socialism*）第九章「無政府主義」。雖然是「譯」，但「述」的地方更多，許多部分是馬君武個人抒發的意見。克喀伯著，獨立之箇人（馬君武）譯，《俄羅斯大風潮》（上海：少年中國，1902），頁13。

105 克喀伯著，獨立之箇人（馬君武）譯，《俄羅斯大風潮》，頁13。克喀伯原文為：“A lady of high birth, Sophia Perovskaia, by the waving of a veil guided the men who threw the fatal bombs at the assassination of Alexander II.” Thomas Kirkup, *A History of Socialism* (London: Adam

所指出的「婦人女子盡力國事，較之男子尤愈易也。」或許可以說明何以中國知識人如此致力於引介「女傑」。

這些小說與文章中，蘇菲亞、薇拉、海珊，不斷被稱為「女豪傑」。將「蘇菲亞」其人其事推而廣之，羅普的小說《東歐女豪傑》亦如此。<sup>106</sup> 羅普在《東歐女豪傑》裡，呈現出如蘇菲亞這般的「弱女子」，卻能充分勝任革命的要角：

你看那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時勢菩薩，他要演演新奇手段，近來不是在我們裡頭造出許多政治上有關係的女英雄嗎？……現在時勢已經變了，強權是用不著了。你不信，試瞧瞧那地球上一個大權力大威勢的人，豈不是被幾個極嬌小極文弱的女孩兒弄倒嗎？<sup>107</sup>

而任克譯述自《近世無政府主義》的〈俄國虛無黨女傑沙勃羅克傳〉<sup>108</sup> 也提到：

夫天下惟最不忍人之入，而後能行最忍之事。……俄

and Charles Black, 1909), p. 212.

- 106 夏曉虹提到「蘇菲亞」故事在中國的傳播：「虛無黨女黨員中，最著名的人物便是蘇菲亞，不僅革命派的刊物《民報》登載過《蘇菲亞傳》，金一（天翹）記述虛無黨歷史的《自由血》中有蘇菲亞的事跡，而且，改良派人士對蘇菲亞也相當敬重。並且，真正使其廣為人知、英名遠播的，也是康有為弟子羅普寫作的《東歐女豪傑》。……經過大量渲染，蘇菲亞這位血統高貴又獻身革命、流血犧牲的女性，在晚清於是贏得極高崇敬。」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109-110。中村忠行（1915-1993）提到羅普《東歐女豪傑》大篇幅引用、翻譯《近世無政府主義》。中村忠行，〈晚清に於ける虛無黨小説〉，《天理大學學報》，卷24號5（1973年3月），頁116-117。
- 107 羽衣女士，〈東歐女豪傑·第一回〉，《新小説》（橫濱），卷1期1（1902年11月14日），頁56。
- 108 任克文章的標題「沙勃羅克」，或許是取自ソフィヤ、ペロウスカヤ（日文羅馬拼音：sofia perousukaya）當中的ソペロカ（soperoka）。



國有虛無黨之一團體，積無數之產業、無數之汗血、無數之爆裂彈以死戰于專制橫狠之政府，殺人如麻、流血如潮，前者仆後者繼而務必易得自由而後已也。考其黨員，有貴族、有平民、有軍人、有學生，而要為其神經線者，乃幾個極仁慈、極溫和的妙齡女兒傾國美人為之耳。<sup>109</sup>

「無害」的「弱女子」、「仁慈、溫和美人」形象與「有害」的「傾國」、「殺人」的反差不斷重複出現，反映男性知識人渴望婦女加入革命行列，能夠實現救國的願望。任克所譯述的沙勃羅克，更表現出了指揮若定、談笑自若以及事母至孝的各種特質，彷彿融合了《鬼啾啾》當中的「英雄豪傑蘇菲亞」與《近世無政府主義》的「蘇菲亞」於一體。<sup>110</sup>

這些譯者所描繪的女傑／女豪傑之形象，實與馬君武在《俄羅斯大風潮》的序言所論及的「豪傑」有異曲同工之妙：

休乎哉，抱改造社會思想者之豪傑乎！其目的或全達，或達其一小部分，或歷數世而達，或歷數十世而達，當其生時，世人皆辱之逐之，以至於戮之，謂其人為誕人，視其說為邪說，然歷數世或數十世之後，則莫不敬式崇拜之。<sup>111</sup>

「蘇菲亞」可謂是「抱改造社會思想之豪傑」。甲午戰後，滿清治下的中國頹弱不振，幾遭列強瓜分，此一情景對

---

109 任克，〈俄國虛無黨女傑沙勃羅克傳〉，《浙江潮》，期7，頁115。

110 舉例而言，任克文中提到蘇菲亞離家，全然無懼於父親的壓制；又描述蘇菲亞性仁慈，體恤病憐，尤孝於母。其展現出強悍的豪傑形象同時，也呈現了女性慈愛的特性。任克，〈俄國虛無黨女傑沙勃羅克傳〉，《浙江潮》，期7，頁116-119。

111 克喀伯著，獨立之箇人（馬君武）譯，《俄羅斯大風潮》，頁1-2。

當時中國知識人來說，危懼之情歷歷在目。受德富蘇峰（1863-1957）啓發的梁啟超在日期間，陸續發表〈英雄與時勢〉、〈善變之豪傑〉、〈豪傑之公腦〉、〈無名之英雄〉等文章，不斷強調英雄是能夠造時勢、成大業之人；豪傑則是持有特長、獨立自由之人。<sup>112</sup> 對豪傑的盼望與「救國」情緒相呼應。蘇菲亞等「女豪傑」以暗殺制裁專制政府（俄國沙皇）的手段，在當時，特別是主張推翻滿清的革命黨人看來，正是中國人改變自己國家的良方。

但是，「蘇菲亞」成爲「英雄」、「豪傑」，在晚清大受歡迎，是否真如符杰祥所述：「不在於其女英雄的神話是否合乎歷史真實，而在於它滿足了危機時代國族主義塑造女英雄神話的歷史需要」？筆者認爲或許並非如此。晚清的知識人並非不重視「蘇菲亞」的真實性。廖仲愷翻譯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第三、六章爲〈虛無黨小史〉與〈蘇菲亞傳〉時，便在文中強調此書的「可信」與「可徵」：

此篇爲日本文學士煙山專太郎先生所著《近世無政府主義》之第三章。……原名為『革命運動之歷史』，譯者易爲今名，求符實也。煙山先生爲早稻田大學講師，以熟悉近世史聞。為外交時報俄事記者，研究有素。篇首羅列著名參考書三十餘種，序例自言語必有所本，又經法學博士有賀長雄先生所校閱，頗有指正。有賀先生爲日俄戰役時日軍中戰時國際法一等外交官，詳知俄羅斯政黨及社會之內容。所言均確爲

---

112 梁啟超，〈自由書〉，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卷2，頁340-341、351、354-355、363。

徵。東邦之虛無黨信史，當以此書為第一。<sup>113</sup>

廖仲愷認為，經過有賀長雄（1860-1921）的校閱與書籍所列的參考書目，證明了煙山這本學術著作並非無的放矢。而這段歷史資料也間接證明了，與中國同為「帝制」的俄國，能夠出現如「蘇菲亞」一般暗殺成功的革命者，中國何以不能？

經過轉譯的中國「蘇菲亞」，在革命黨知識人的詮釋裡，鮮明標誌出了通過暴力革命以救國的人物形象。但也由於她的傳記被置於「近世無政府主義」的歷史思潮脈絡中，「蘇菲亞」對當時中國知識人所勾起的政治想像，更傾向於一名運用炸彈、暴力暗殺，實現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而與日本自由民權脈絡下，致力追求立憲議會制度、自由權利的「自由民主主義者」有所區別。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近世無政府主義》被中國知識人不斷引用與翻譯同時，司特普尼亞克《地下的俄羅斯》也循著協助中國革命的日本知識人進入中國。1906年，由宮崎滔天（1871-1922）、池亨吉（1873-1954）等擁護孫文（1866-1925）革命派的日本知識人創刊的《革命評論》，刊出了一篇關於司特普尼亞克的文章，題為「志士的風骨司特普尼亞克」。<sup>114</sup> 文中除了介紹其生平之外，也提到《地下的俄羅斯》已被革命評論社同仁譯為《露國革命血鬪體》。<sup>115</sup> 同一

---

113 淵實（廖仲愷），〈來稿：虛無黨小史〉，《民報》，期 11（1907年 1 月 25 日），頁 89。

114 該刊主要由宮崎滔天、池亨吉、和田三郎（1872-1926，曾任板垣退助秘書）、萱野長知（1873-1947）、平山周（1870-1940）、清藤幸七郎（1872-1931）、北一輝（1883-1937）等人所創。

115 「此書我社同仁入手後，已翻譯脫稿，應得於近日內出版。」葭湖，

年春季，宋教仁（1882-1913）也在日記中表示：「宮崎滔天寫信詢余譯地下之露西亞事如何，余回信謂鄧孟碩前曾擔任之云。」<sup>116</sup>

而當時在日本的魯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也曾以獨應為筆名，在《天義》發表文章，提及司特普尼亞克的《地下的俄羅斯》：

斯諦勃弔克 Stepniak，名舍爾俱 Sergeï，姓克羅夫靖斯可 Kravchinsky，此其別號，華言『大野之子』。以 1852 年生露西亞，與克洛頗特庚全為卻軻夫斯兀 Chaikovski 黨人，運動農工，至為有力。後，逃亡英國，著書佈其國中慘狀。中有《地下之俄國》一書，文情皆勝，最有名。露政府厲禁，而手本抄傳，其流益廣。<sup>117</sup>

更可見此書在中國知識人之間的流行。

在日本與中國，《地下的俄羅斯》全本的翻譯，還要等

〈志士の風骨ステツプニアク〉，《革命評論》（東京），號 2（1906 年 9 月 20 日），頁 6。可惜的是，筆者未能找到此書，無法進一步進行翻譯方面的分析。此外，根據日本政治史學者林茂（1912-1987）所做的解題，《血鬪體》一書的譯者應是和田三郎。林茂，〈「東京社會新聞」「革命評論」解題〉，收入勞働運動史研究会編，《明治社會主義史料集 8：東京社會新聞・革命評論》（東京：明治文獻刊行會，1962），頁 x。

116 1906 年 4 月 15 日的日記。見宋教仁，《我之歷史》（臺北：文星書店，1962），頁 141。洪德先提及宋教仁日記的部分，見洪德先，《無政府主義與辛亥革命》（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2），頁 37。

117 獨應，〈讀書雜拾（二）〉，《天義》（東京），卷 8、9、10 合刊（1907 年 10 月 30 日），頁 115。關於「獨應」為魯迅、周作人兩人共同筆名的考證，見陳漱渝，〈再談《天義報》上署名「獨應」的文章〉，《新文學史料》，期 3（1980 年），頁 109-115。

到 1920 年代宮崎龍介（1892-1971）《地底の露西亞：革命物語》與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1904-2005）的譯本《俄國虛無主義運動史話》。<sup>118</sup> 但毫無疑問的是，司特普尼亞克所書寫的「蘇菲亞」等「有名的」革命者，與俄國 19 世紀革命的悲劇，在 20 世紀的日本與中國，已隨著書籍的傳播與翻譯深入讀者心中。

## 結論

本文根據司特普尼亞克《地下的俄羅斯》、宮崎夢柳《鬼啾啾》、煙山專太郎的《近世無政府主義》，以及在中國出現的數種蘇菲亞相關文本，探討俄國 19 世紀革命運動中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蘇菲亞」，逐步成為日本與中國「女傑」的形塑與轉化過程。

司特普尼亞克的回憶錄《地下的俄羅斯》是「蘇菲亞」形象傳播過程最關鍵的文本。這本回憶錄，既是作者對流亡、入獄、死去革命同伴的紀念；也是面向歐洲讀者所做的革命宣傳。由於作者本人即是革命運動的見證與參與者，藉由不斷強調「誠實」與「去政治化」，強化了該書的說服力。他以談論友人的回憶形式，描述 8 位革命者的日常生活，打

---

118 宮崎龍介，《地底の露西亞：革命物語》（東京：大鐙閣，1920）。巴金自述：「我 1926 年在上海時讀到這書的日譯本，後來在巴黎又先後得到西班牙文、英文、法文三種譯本，對照著讀了幾遍，被此書底文筆和事實感動到極點，便起了翻譯的念頭。然而因為忙着別的事情，這本小小的書竟然經過了幾年的長時間才得以譯成。」巴金，〈《俄國虛無主義運動史話》後記〉，《俄國虛無主義運動史話》（上海：新生活出版社，1936），後記頁 1。

動歐洲讀者對俄國革命運動的感受。同時由於報紙與雜誌的普及，司特普尼亞克更通過人們希望了解這些「恐怖分子」的心理，使這本書大為暢銷。

「蘇菲亞」是他在《地下的俄羅斯》中介紹的 8 位革命者之一，但司特普尼亞克對她的人物簡介，更貼近「傳記」的形式。比起薇拉·查蘇利奇，司特普尼亞克對她的出身、家庭、經歷都有詳細的描寫。他筆下的「蘇菲亞」具備了女性的美麗、親切、溫柔；同時也擁有媲美男性的堅毅、剛強。她與母親的感情，以及她在被捕後的謙遜與受刑時的坦然，將她的悲劇形象鋪陳到了極致。這位被司特普尼亞克措意塑造的「革命者」，成為日本自由民權運動者與中國亟欲推翻滿清的革命者心中的理想革命典範。

自由民權運動時期，宮崎夢柳的政治小說《鬼啾啾》便以《地下的俄羅斯》為底本，將「蘇菲亞」轉化為「志士」和「豪傑」形象。當然，此處的志士、豪傑，並非只是傳統文學脈絡中，才智過人、志向專一的表述，而是帶有現代政治改革者——制憲、開設議會的、帶領日本邁向進步的現代的「志士」與「豪傑」。

而在 20 世紀初，日本歷史學者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也選用了《地下的俄羅斯》作為撰寫「虛無黨女傑」一章的參考。這顯示出《地下的俄羅斯》已被視為俄國革命運動歷史的史料，而不僅是一部「回憶散文」。煙山所描繪的「蘇菲亞」形象，雖然立基於司特普尼亞克的描述，但在蘇菲亞與母親的互動上，煙山以「孝」的概念，成功地將「蘇菲亞」放入東亞的文化傳統詮釋當中。使得「蘇菲亞」形象進入中國後，「孝」的特徵成為她鮮明的標記。煙山根據當

時歐洲的各種研究成果，將 19 世紀俄國的革命運動放在無政府主義的思潮下加以理解的方式，也成為中國知識人想像「蘇菲亞」是「無政府主義」女傑形象的連結。

要再指出的是，「蘇菲亞」形象並非獨立於其他革命者之外，而是與其他革命者，如：薇拉·查蘇利奇、海珊·赫夫曼、克魯泡特金等人共同出現在日本與中國的文本之中。然而，正是因為「蘇菲亞」以女性的身分，作為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領導者，同時被判處死刑的悲劇色彩，讓她的經歷更受到知識人的關注。

通過文本轉譯、形象生成脈絡的梳理，筆者認為，司特普尼亞克在著作中刻意減少「革命」、「暗殺」等政治性描述，強化革命者的個人道德與自我犧牲的特質，使「蘇菲亞」形象進入面臨政治轉型的日本與中國後，能迅速轉化為日本、中國文化中重視道德與正義的「女傑」形象，成為政治改革者的典範。

## 徵引書目

### 一、報刊

#### (一) 中文

- 《大陸報》（上海），1903。  
 《天義》（東京），1907。  
 《民報》（東京），1907。  
 《申報》（上海），1880、1881。  
 《革命評論》（東京），1906。  
 《浙江潮》（東京），1903。  
 《唯一趣報有所謂》（香港），1905。  
 《新小說》（橫濱），1902。  
 《新民叢報》（橫濱），1903。  
 《萬國公報》（上海），1880。

#### (二) 日文

- 《東京日日新聞》（東京），1878、1886。  
 《東京曙新聞》（東京），1878。

#### (三) 西文

- Boston Daily Globe* (Boston), 1895.  
*Chicago Tribune* (Chicago), 1878.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Manchester), 1895.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Boston), 1891, 1894.  
*The Times* (London), 1885.



## 二、史料

### (一) 中文

巴金，《俄國虛無主義運動史話》。上海：新生活出版社，1936。  
克喀伯著，獨立之箇人（馬君武）譯，《俄羅斯大風潮》。上海：  
少年中國學會，1902。

宋教仁，《我之歷史》。臺北：文星書店，1962。

梁啟超，〈自由書〉，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卷2。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曾樸，《孽海花》。臺北：桂冠，2002。

福井準造著，趙必振譯，《近世社會主義》。上海：廣智書局，  
1903。

### (二) 日文

三輪田眞佐子，《女子教育要言》。東京：國光社，1897。

小島玄壽編，《日本列女傳》，卷1。東京：山中八郎，1878。

中江兆民著，松永昌三編，《中江兆民集》。東京：筑摩書房，  
1974。

安東久次郎譯述，《露國虛無黨ノ由來》。東京：東雲館藏，1882。

安部磯雄，《社會問題解釈法》。東京：東京專門學校，1901。

杉田策太郎，《烈女ノ疑獄：魯國奇聞》。東京：由己社，1882。

谷川惠一，〈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解題〉，收入宮崎夢柳，《リ  
プリント日本近代文学 81・虚無党実伝記 鬼啾啾》。東京：  
平凡社，2007。

宮崎夢柳，《憂世の涕淚・一滴千金》，卷2。東京：成文舎，1884。

宮崎夢柳，《芒の一と叢》。大阪：駸駸堂本店，1888。

宮崎夢柳，《虛無黨實傳記・鬼啾啾》，收入山田有策、前田愛  
注釋，《日本近代文學大系 2・明治政治小説集》。東京：角

川書店，1974。

宮崎龍介，《地底の露西亞：革命物語》。東京：大鏡閣，1920。

島田三郎，《社會主義概評》。東京：警醒社，1901。

清水卯之助，〈小伝〉，收入管野須賀子，《管野須賀子全集》，集3。東京：弘隆社，1984。

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東京：東京專門學校，1902。

福井準造，《近世社會主義》。東京：有斐閣，1899。

### （三）西文

Bourdeau, Jean. *Le Socialisme allemand et le Nihilisme russe*. Paris: F. Alcan, 1892.

Dippel, Joseph. *Der russische Nihilismus*. Passau: Waldbauer, 1882.

K. Staatsministerium des Innern (hg.). *Amtsblatt des Königlichen Staatsministeriums des Innern*. Vol. 12. Munich: Akademische Buchdruckerei von F. Staub, 1884.

Kirkup, Thomas. *A History of Socialism*.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09.

Kropotkin, Peter. *Memoirs of Revolutionist II*.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99.

Kupczanko, Gregor. *Der Russische Nihilismus*. Leipzig: Verlag von Wilhelm Friedrich, 1884.

Stepniak, S. *Underground Russia: Revolutionary Profiles and Sketches from Lif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3.

## 三、專書

### （一）中文

卡斯·穆德(Cas Mudde)、克里斯托巴·卡特瓦塞爾(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著，徐承恩譯，《民粹主義》。新北：左岸文化，2022。

余英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臺北：時報文化，2007。

李冬木，《魯迅精神史探源：個人·狂人·國民性》。臺北：秀威，2019。

牧原憲夫著，臧志軍譯，《民權與憲法》。香港：中和出版，2015。

柯惠鈴，《民國女力：近代女權歷史的挖掘、重構與新詮釋》。臺北：臺灣商務，2019。

洪德先，《無政府主義與辛亥革命》。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2。

胡纓著，龍瑜成、彭姍姍譯，《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屠格涅夫 (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著，耿濟之原譯，陳逸重譯，《父與子》。新北：遠景，2016。

符杰祥，《國族迷思：現代中國的道德理想與文學命運》。臺北：秀威，2015。

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臺北：群學出版，2020。

## (二) 日文

友田昌宏編著，《東北の近代と自由民権》。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17。

安在邦夫、田崎公司編著，《自由民権の再発見》。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06。

安在邦夫，《自由民権運動史への招待》。東京：吉田書店，2012。

寺崎修，《自由民権運動の研究——急進的自由民権運動家の軌跡》。東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研究會，2008。

西田谷洋，《政治小説の形成：始まりの近代とその表現思想》。

神奈川：世織書房，2010。

後藤靖，《自由民権運動の展開》。東京：有斐閣，1966。

柳田泉，《政治小説研究》，卷上。東京：春秋社，1935。

島田英明，《歴史と永遠：江戸後期の思想水脈》。東京：岩波書店，2018。

狹間直樹，《中國社會主義の黎明》。東京：岩波書店，1976。

梅森直之，《初期社会主義の地形學——大杉榮とその時代》。

東京：有志舎，2016。

渡邊浩，《明治革命・性・文明——政治思想史の冒険》。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21。

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94。

### (三) 西文

Gibson, Chelsea C. “Russia's Martyr-Heroines: Women, Violence, and the American Campaign for a Free Russia, 1878-1920.” Ph.D.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19.

Maxwell, Margaret. *Narodniki Women: Russian Women Who Sa-crificed Themselves for the Dream of Freedom*.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0.

Stites, Richar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Taratuta, Evgeniia Aleksandrovna. *С.М. Степняк-Кравчинский —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и писатель*. Moscow: Khudozh lit., 1973.

Venturi, Franco. *Root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19th Century Russia*. London: Phoenix Press, 2001.

## 四、論文

### (一) 中文

- 田露，〈蘇菲亞形象的傳入與晚清俠義小說創作的轉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期 2，2010 年，頁 61-74。
- 許慧琦，〈去性化的「娜拉」五四新女性形象的論述策略〉，《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0，2002 年 12 月，頁 59-101。
- 陳漱渝，〈再談《天義報》上署名「獨應」的文章〉，《新文學史料》，期 3，1980 年，頁 109-115。
- 蕭涵珍，〈《剪燈新話·牡丹燈記》的傳播與改編—從《浮牡丹全傳》到《戲場花牡丹燈籠》〉，《漢學研究》，卷 36 期 4，2018 年 12 月，頁 143-174。
- 賴芳伶，〈清末小說《東歐女豪傑》析論〉，《文史學報》，期 23，1993 年 3 月，頁 63-79。

### (二) 日文

- 中村忠行，〈晚清に於ける虚無党小説〉，《天理大學學報》，卷 24 號 5，1973 年 3 月，頁 108-154。
- 林茂，〈『東京社会新聞』『革命評論』解説〉，收入労働運動史研究会編，《明治社會主義史料集 8：東京社會新聞・革命評論》。東京：明治文献刊行会，1962，頁 III-XII。
- 湯薇薇，〈佳人から「女志士」へ——宮崎夢柳の『鬼啾々』『芒の一と叢』を中心に——〉，《國際日本文学研究集會會議錄》，號 29，2006 年 3 月，頁 155-162。
- 越智治雄，〈地底の夢柳—虚無党のイメージ〉，《日本文学》，卷 22 期 7，1973 年 7 月，頁 9-12。
- 越智治雄，〈地底の夢柳（二）—虚無党のイメージ〉，《日本文学》，卷 22 期 12，1973 年 12 月，頁 64-72。

齋島巨，〈ロシア虚無党文学の系譜：宮崎夢柳『虚無党実伝 鬼  
啾啾』への道程〉，《文学史を読みかえる・論集》，期 2，  
2014 年 8 月，頁 64-123。

(三) 西文

Good, Jane E. “America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1888-1905.” *The Russian Review* 41:3, July 1982, pp. 273-287.

Patyk, Lynn Ellen. “Remembering ‘The Terrorism’: Sergei  
Stepniak-Karvchinskii’s *Underground Russia*.” *Slavic Review*  
68:4, Winter 2009, pp. 758-781.

## Revisiting the “Revolutionary Heroine”: The Disse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Sophia” in Japan and China (1881-1911)

Chan I-ying

###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how the character Sophia in *Underground Russia*, a work written by Russian revolutionary Sergey Stepniak-Kravchinsky (1851-1895), has been continually transformed in various works to respond to modern political shifts, such as the Japanese political novel *Kishubshu* 鬼啾啾 and the historical academic work *Kinsei museifushugi* 近世無政府主義 (*Modern Anarchism*) as well as Chinese novels and biographies including *Dong Ou nü haojie* 東歐女豪傑 (*Heroines of Eastern Europe*) and “Eguo xuwudang nüjie Shaboluo ke zhuan” 俄國虛無黨女傑沙勃羅克傳 (“The Biography of Russian Nihilist Heroine Sophia Perovskaya”).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s and strategies of Stepniak in writing *Underground Russia*, along with the image and significance of Sophia in his work. Secondly, the portrayal of Sophia in *Kishubshu*, adapted by Japanese civil rights activist Miyazaki Muryu 宮崎夢柳 (1855-1889), is

explored. The third part delves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phia's image in historical scholar Kemuyama Sentarou's 煙山專太郎 (1877-1954) *Modern Anarchism*. Finally, the fourth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image of Sophia as 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based on Japanese works. By tracing the deeds of Sophia and the evolution of her image, we can more clearly outli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her significance in various cultural contexts, as well as presenting a picture of the interweaving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symbolism within the global contexts of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Keywords: heroine, nihilism, revolution, Sophia, terrorist